

境外谈

张清华 著



李延青 / 主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6513129

B83-53

Z150



李延青 主编

中国学者海外演讲丛书

境外谈

张清华 著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



1825-53

2/50

花山文艺出版社

651312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境外谈文/张清华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

(中国学者海外演讲丛书/李延青主编)

ISBN 7-80673-364-7

I. 境... II. 张... III. 美学 - 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B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959 号

丛 书 名: 中国学者海外演讲丛书

主 编: 李延青

书 名: 境外谈文

著 者: 张清华

选题策划: 李津生

责任编辑: 张采鑫 贾启森

美术编辑: 李文侠

封面设计: 王 旭 李文侠

责任校对: 贾 伟 王世卿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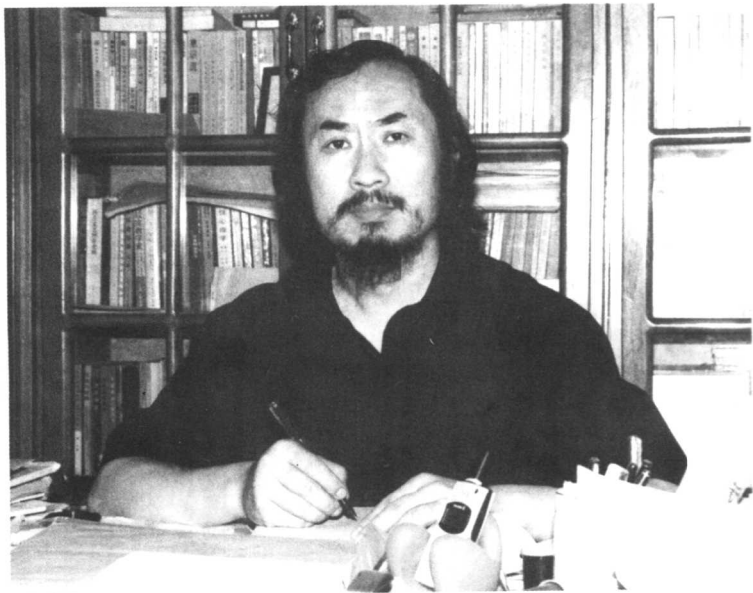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73-364-7/I·215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张清华 1963年生于山东博兴。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批评与教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0余万字；出版有《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内心的迷津：当代诗歌与诗学求问录》（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等学术著作4部。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刘勰文艺评论奖。2000年秋至2001年春受邀赴德国海德堡大学古代学与东方学学院讲学并进行学术交流。

谨以此书鸣谢

Prof. Dr. Andrea M. Riemenschnitter

洪安瑞教授（瑞士苏黎世大学）

Prof. D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魏格林教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传播者礼赞

——《中国学者海外演讲丛书》序

余秋雨先生在一次谈中华文化复兴的演讲中，把既往中华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形象比喻成“三座桥”。第一座是“经典理学之桥”，指的是我们古代的好多经典——如先秦哲学，对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第二座是“世俗民艺之桥”，指我们许许多多华人漂洋过海，从而将自己日常的文化生态方式——比如龙舟、舞狮、功夫、餐饮等——具有质感的文化实践状态带到了世界各地；第三座曰“信息传媒之桥”，指当年传教士写回去的信件和游记、调查报告的出版问世，以及现在的摄影作品、纪录片、电视、网络等等的传播。由此，余先生引出了他认为未来需要搭建的能够带来或者说标志着中华文化复兴的“第四座桥”——即在承接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表现活生生的中国人群体灵魂的学理或形象性的大作品的产生——它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邻居共同感动，从而使世人真正明白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这次演讲中，余先生还提出了自己一个判断：2020年左右，中华文化可以出现一个范围相当广泛的复兴。我们十分钦佩余先生为中华文化复兴身体力行的积极努力和呼吁，但却不敢同意余先生这

一过于热情的判断。

诚如余先生所言，“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不见得有文化尊严”，“中国人的尊严最终应该由文化来给予”。如果“当好多民族都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增添自己的重量，都用自己的文化来沟通世界的整体标准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地球就会变得更美好”。但是，一种文化能否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比较大的复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既有其主观因素也有其客观因素，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中华文化能否复兴，我们想至少应该考虑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中华文化自身是否具有与时代相适应的内在素质；二是时代是否具有相应的文化需求。所谓文化的内在素质，是一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价值观念和内涵。在经济居统治地位的当代，全球化、市场化为文化的传播、融合、发展创造了环境和机遇。而高科技、数字化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等一系列矛盾的凸显，使得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平衡已成为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认识和感发生命的力量及其内在的重和谐、修身等价值导向无疑能够帮助市场经济时代的人类发现、认识和完善自我，满足人类的文化精神需求。然而我们认为，现阶段时代的普遍文化（精神）需求尚未形成——这一点正是阻碍中华文化复兴的根本所在。

时代的文化需求应该是人类的一种自觉行为。对于刚刚彻底摆脱战争和动乱不久，正以全副精力投入经济建设之中的中华民族，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需求何时才能得以产生？我们认为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在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某一历史时期。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复兴需要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几年前，加拿大皇家学会华裔院士叶嘉莹先生上书国家有关领导，建议在中小学普及古诗词并得到采纳。叶先生数十年奔走于世界各地，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和中华文化的推广传播。



她的建议说明，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不是仅靠几个人的努力就能办得到的，必须具备广泛的基础。所以我赞同余秋雨先生的说法，即使是标志中华文化复兴的那种大作品，首先“第一感动层应该是海内”。一种文化只有首先在本土繁荣，进而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看来，文化的繁荣并非一定会与经济同步，但经济对于文化需求产生的作用却不容忽视。中外文化史上不乏“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平衡状态”的成例，如大家熟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印度，当时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都十分落后，但是却产生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样的一批灿若星辰的大作家。然而我们在注意到这些国家贫穷落后的时候，更应该注意的是作家本身衣食无忧的家庭背景和良好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精神追求。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繁荣亦不都产生在太平盛世，然而，以文取仕的制度和文人的社会地位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含金量”。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可见，精神需求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心理学大师马斯洛把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分为七个层次，并认为只有较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时，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发生。他把属于文化范畴的“认识需要”和“审美需要”列在较高的层次，而把“生理需要”视为最低级的基本要求。中国有句俗语：十年树木，百年育人。有一种理解，百年就是三代人——说一个家族要经过三代人的努力，认真准备，才具备真正培养造就人才的能力。这里的努力、准备应该主要是指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储备和积累。

现阶段，中国致力解决的可以说仍是“生理需要”，经济建设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都将是整个民族压倒一切的历史性重任。但可以肯定，随着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全民文化素质、品格的不断提高，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国将会逐步形成一个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相对成熟、独立，并具有广泛性的“富裕阶

层”——他们不但具有稳定可观的经济收入，较高层次的文化修养和精神追求，而且还会具备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东方文化归属意识，来自他们的自觉的文化追求将代表和体现整个时代的精神共鸣，成为催进中华文化实现世界性复兴的必然条件。

然而，一个时期的社会文化需求是不会凭空产生的。正如“百年育人”是文化、经济等条件积累的产物一样，余秋雨先生所期盼的那种能够表现中国人“灵魂的群体存在状态”的大作品的产生，恐怕也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人类登月的壮举固然辉煌，但走向辉煌的过程却意味着艰辛与寂寞。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弘扬者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是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最前沿、最直接的铺路搭桥者，《中国学者海外演讲丛书》正是这种传播的结果。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学者、作家、艺术家的对外学术交流不断加强，这里选择的三部书稿就是我们的学者在国外大学等学术场所的演讲稿，它们或谈美学或谈佛学或谈文学，既有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又充分体现了学者在各自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因为环境和听众等因素的不同，这类讲稿均表现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特色，亦为国内读者的学习研究提供了方便，这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原因之一。

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中华文化复兴起到增砖添瓦的作用。

编者

2003年10月7日



目 录



上篇 理论探讨

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叙事传统	3
当代红色叙事中的历史观	17
启蒙历史叙事的重现与转型	26
新历史主义叙事的现象与特征	56

中篇 作家例析

余华的历史叙事	89
苏童小说中的新历史主义意识	113
格非小说中的新历史主义意识	133
莫言的新历史主义叙事	150
作为新历史主义叙事的《长恨歌》	170
第三代诗歌的新历史主义意识	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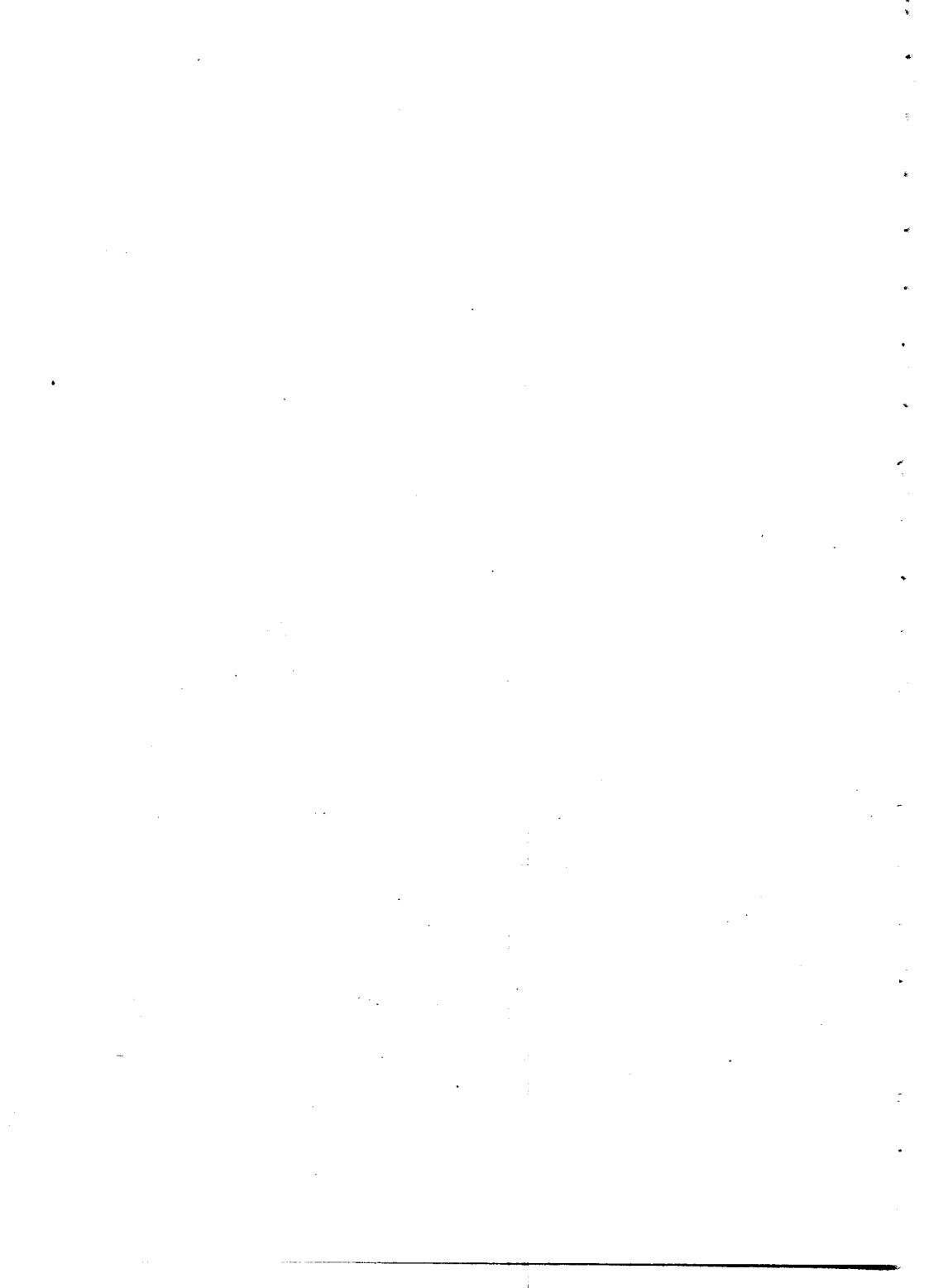
下篇 专题演讲

由语言通向历史：王朔的意义	209
精神分析与中国当代文学	230

民间理念在当代的流变及其形态	255
历史的回声：关于张炜的《家族》	282
《乡村温柔》中的乡村历史叙事	294
后记	309



上 篇
理 论 探 讨





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叙事传统

一、中国文学的“历史叙事”渊源

(一) 历史与小说的产生

中国的小说和其他民族的小说在发源上有所差异。一般民族的小说主要源自神话、寓言和民间故事，而对中国的小说而言，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源头，这就是历史。中国最早的“小说”是从历史中分离出来的。“史”——“传”——“小说”，这是一个基本的脱胎发展的轨迹。南朝齐梁间的著名文艺批评家刘勰（465?—532?）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曾详论“史”的起源：“史，使也。”“使”即使用之义。意思是，所谓历史，不过是被朝廷使用的文牍和文案之人。这应了现代人的一句话，所谓历史不过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奴婢罢了，它必须服从权力的意志。但这也只是说法的一种，更早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则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这个“持中”很重要，“中，正也”，也就是公正，求真；所以“良史”和“良史之笔”，又是中国历史学中常见的佳话。历史在中国发源甚早，轩辕黄帝时即开始设立“史

官”，史官里有仓颉，主管文字的职务，遂有了传说中仓颉造字乃有文字记事的说法。《礼记·曲礼上》说的“史载笔”，意即是说“史官带着笔墨文具”，史官就是供奉君王左右的记录者，其分工为，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记言的书成为“经书”，如《尚书》；记事的书便成为“史书”，如《春秋》。至周时，周公旦制定了历法，国家大事更得以纪年的形式连贯地编写出来，这样就有了完整和系统的史书；东周春秋时，史官“太师”（太史）作了《春秋》。历代都有自己的史官，如司马迁就叫太史令。

有了“史”以后，又有了“传”。传，转也，流转流传之意。传者对史书又加了自己的研究和理解、阐释和想象，所谓对“春秋笔法”的发扬光大。这就开始出现了“描写”、“刻画”、“引语”、“连缀”甚至“曲笔”等等叙事因素，这样小说的诸多叙事功能就开始借助史传得以发育。在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氏的《春秋左氏传》中，历史叙述已展现了很强的文学魅力。现在我们通常所讲的“先秦文学”，除了《诗经》和《楚辞》之外，主要就是指“诸子”的哲学或历史著作，他们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经典的文学文本。

现代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大家鲁迅认为，小说的出现，乃是“史的末流”。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自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的开端。但小说的原始胚胎的发育却很早，在先秦诸子的多数著作中都有很多“寓言”，这些寓言在文体特点上，即很接近原始的故事和小说。“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笔下，《庄子·外物》中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说，以浅陋的言辞和小道理去谋求高远的前途名声，距离太远了。在这里，“小说”的意思是“小道理”和浅陋之见。这离后来的“小说”本意，显然有一定差距，可是它也“暗示”出中国人对“小说”这一文类的原发性的“歧视”。真正将“小说”视为文体，始于东汉史家班固，他在《汉



书·艺文志》中列出了“小说”一类文体，还专就“小说家”的概念作了阐释：“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下层官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其中一是强调了写小说的主体地位之“低”，二是强调了小说本身作为“街谈巷语”的传言性质。这样的界定当然不能说不准确，但其与“正史”的权威性相比，它的可信度与真实性就受到大大的质疑。这显然降低了其“历史”的价值，但却也表明了其更接近于“虚构”（fiction）的“文学”的特性。而且班固还引用了孔子的话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①。

粗略来说，中国古代的小说叙事有四个大类：一是“神魔小说”。它的出现大约最早，从远古的“神话”演变为六朝的“志怪”，后又和佛道宗教题材产生密切关系，最典型的例子是《西游记》。在“唐传奇”和明清的“笔记小说”中，又有与世情生活相接近的趋势，《聊斋志异》是这种结合的产物；还有与历史小说结合的产物，如《封神演义》之类。顺便说一句，中国古代文人的主流观念里一般不太认同“白话小说”，而认同文言“笔记小说”，而“笔记小说”大都与神怪题材有关。二是“世情小说”。这类可能成就最大，它的出现比较晚，典型的例子是话本与白话小说，最早大约出现于宋代，以明代拟话本小说为最典型，长篇小说的成就可谓最高，先有“第一奇书”《金瓶梅》，后有中国文学的集大成者《红楼梦》，这似乎也是中国小说传统中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学最接近的部分。三是“侠义小说”。这一类比较难说清楚，它似乎比较“边缘化”，和历史小说有密切的关系，其代表性的例子是《水浒传》，晚近些的有《七侠五义》一类，至当代又有“新武侠小说”，如金庸、古龙等。但《水浒传》似乎也可以归到历史小说中，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曾

^① 《论语·子张》。

戏谈及“侠”的源流，认为源自墨子之徒，最早的侠是“墨者的末流”，其忠诚勇敢乃至“以死为终极的目的”，但后来则慢慢沦落到“盗匪”和“流氓”的边缘，变成了“奴才”。^① 侠义小说在中国也是长盛不衰的一个品种，这同样很值得研究。四是“讲史小说”。它起源同样很早，而且就数量而言无疑是最多的。如前文所述，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所记的“稗官”所作的“小说”，即属于中国人习惯上讲的“稗史”一类。宋元以后，随着“说话”这种大众文艺传播形式在城市的流行，讲史小说渐渐成为一种都市的日常文化消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这样的传播背景下渐渐成熟并产生的，他们是文人和一般市民阶层共同创造的产物。随后在明清之际，讲史小说大量出现，以至于所有的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都出现了“演义”之作。“历史的消费”，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它说明，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是特别强烈、发达和丰富的，其中所蕴涵的“历史美学”也是特别丰富和复杂的。另外，即便是《红楼梦》这样的世情小说，也可以看做是另一类型的历史小说——它和现代意义上的“家族历史叙事”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当然也可以属于广义的历史叙事。

(二) 历史小说的各种典范类型

上述几个大的小说类型，如果从语言与叙述特征上看，又有“文言”和“白话”两种不同形式；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很难将二者严格区分开来。从时间上看，白话小说产生比较晚，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以及明代而下出现的大量长篇小说，是比较典范的白话小说。但一直到清代，文言小说仍然是文人小说的主流，因为它看起来似乎更接近“正统”的文学，而白话小说就比较

^① 《三闲集》，《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